月亮上的相思

域外漫筆

林中洋

距離中秋節還有幾個星期的時間，漢堡的亞洲超市裡就已經擺上了各色各樣的月餅。這是近些年來才有的事情。我小的時候並不愛吃這個，覺得太硬太甜，後來有了比較可口的廣式蓮蓉蛋黃月餅，又不明白爲什麼要做成方的，總之，月餅是唯一的一種我不吃也不會去想念的食物。但是到了國外，這種著名的傳統食品就忽然有了一種特殊的意義，好像是實物化了的鄉愁，所以不管喜不喜歡吃，每年都會選上一盒帶回家去。

中國人對月亮的感情是無與倫比的。不管是后羿與嫦娥，還是李白與蘇軾，月亮上聚集了太多的典故與詩歌，更何況，我們還有月餅與中秋節。從月亮的象徵意義上講，它代表的東西主要集中在鄉愁、離情、思念和時間與永恆幾個方面。在「對月思鄉」的情結上，李白的《靜夜思》和蘇軾的《水調歌頭》都是千古的絕唱，戴叔倫的「月出照關山，秋風人未還。清光無遠近，鄉淚半書間」將他鄉離人的游子心情表達得眞切感人；在對月憑欄的時刻，人們會有淡淡的憂傷，在蒼茫天地間，觸摸自己的心靈，尋找自身與世間萬物之間的連接，或許會悲嘆形單影隻，或許會感慨似水流年。李商隱的「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描寫的正是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心境。面對一輪明月，也會引發人對時間、對人生、對世界的思考，張若虛在《春江花月夜》寫道：「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時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寫的就是這種哲學理性的感悟。

在月亮上寄託相思，並不是中國人的獨創。在歐洲的文學、繪畫和音樂當中，月亮作爲思念的象徵是經常出現的題材。尤其在浪漫主義文學階段，月夜、蘭花與夜鶯更是詩人們鍾愛的意象。明月是鄉愁，是思念，也是對美與愛的嚮往，它是柔美的，也是憂鬱的，在月光下，人會有莫名的觸動，會有無言的感傷，面對一輪明月，人的思緒既眞實又遙遠，也正因爲如此，它被無數的詩人反覆地吟唱。歌德在《致月亮》裡，將自己在靜靜地霧一般地籠罩着山谷叢林的月光下所感受到的那種心靈被釋放的感觸描寫得深切感人；在《給上升的滿月》中，歌德的字裡行間都通透着對心愛的人刻骨的想念，他希望那一輪滿月可以向他「證明被人愛着／即使愛人在遙遠的地方」。作爲浪漫主義的代表詩人，艾辛多夫的《月夜》與布里塔諾的《月下的織女》堪稱這一時期標誌性的詩篇。在《月夜》裡，艾辛多夫想到了生與死、此岸與彼岸，在這樣一個天空親吻着大地的夜晚，他希望自己的靈魂可以張開翅膀，飛向永恆的歸宿。在《月下的織女》中，布里塔諾將一位坐在月光下紡織的女子對自己逝去的戀人深切的思念，那欲哭無淚、欲訴無聲的複雜心情表達得淋漓盡致，讀來令人動容。

所以，從意象上來講，月亮所代表的東西在古今中外都差不多，因爲人的情感畢竟是共通的。

作爲一個常年生活在異鄉的人，這中秋節當然就有了更加特殊的意義。雖然我仍舊不喜歡吃月餅，也知道思親不一定非要在佳節，但還是希望能在中秋的夜晚看到月亮。可惜，德國的秋天，陰晴不定，看不到月亮是常有的事情。有一年的中秋，我坐在陽台上，看着一輪明月緩緩升起，在無雲的夜空中，它顯得出奇的大，也出奇地亮，將人的影子清晰地投射在地上，恍若白晝，我不由驚嘆，這到底是八月十五的月亮啊！還有一年，陰雲密布，左右不見月亮的蹤影，到了臨睡前，我不甘心，又出去看，起風了，滿耳是草木在風中搖擺的聲響，很有些淒涼，這個時候，一輪清月在雲間探出頭來，顯得又高又遠，在雲裡時隱時現，我的眼睛追隨着它的身影，彷彿追隨着一份無法言說的心情，竟忽然無端地落下淚來。

以前的中原人走到關外，就覺得已經到了天邊了；現在的人走得更遠，連「千里共嬋娟」都不可能了，但是不管是不是能夠同時看到，那畢竟是同一輪月亮。

絲綢作手紙

史叢譚

嚴陽

絲綢作手紙？你沒有看錯。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這樣十分另類的事，並且白紙黑字記載在明人謝肇淛《五雜組·卷九》中：「大內供御溷廁所用，乃川中貢野蠶所吐成繭，織以帛，大僅如紙。每供御用之物，即便棄擲。」

這番話大意是說，皇帝居住的宮殿裡的廁所所用的手紙，是由四川進貢來的——乃是由野蠶的繭抽取的絲織成的綢緞當的手紙；這樣的綢緞只跟紙張大小相當，每次皇帝用過之後便會扔掉。這樣的做法無疑是一種浪費，讓人看到會十分心疼。後來明孝宗時，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一度改變了這一情況：某一日，一個宮人把皇帝便後丟掉的絲綢收集起來，洗乾淨，縫了一塊門簾，「廢物利用」。巧的是，這窗簾大概是因爲很多特別，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一番詢問之後明孝宗知道了門簾的來歷，他感覺用絲綢作「手紙」太奢侈了，便責令地方停止進貢，改用紙張。

明朝的皇帝用絲綢作手紙，是有相當的底氣的。這是因爲在明朝的商品經濟相當發達，其經濟總量約佔世界的三分一——其GDP排名在那個年代毫無疑問位居世界第一。作爲一國皇帝，整個天下都是他的，拿絲綢作手紙又算得了什麼？當然，從明孝宗在知道了宮人特別製作的窗簾之後，他便責令地方停止進貢，改用紙張的情況看，這還未必是他本人的主張，更有可能的下面的臣子爲拍他的馬屁，爲突出皇帝之人應該特殊待遇而這樣做的。也就是說，明孝宗本人多少還是有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的意識的。

故事到這裡並沒有結束：明孝宗下令停止進貢特殊手紙之後，四川不少本來靠這個爲生的村民因此而失業，因此明孝宗只好又下令恢復進貢，繼續以絲綢爲手紙。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明孝宗顯然對市場經濟的規律缺乏深刻的認識，沒有能針對宮中絲綢改紙張以後帶來的負面效應進行認眞的調查與研究，進而找出更好的對策，比如說，引導原來以加工野蠶繭爲絲綢的村民改行從事其他生產，或者是積極尋找野蠶繭織成的絲綢的手紙之外的出路——例如說，加工製作成宮中所需乃至民間所需的窗簾；所以，才會讓宮中這一小小的改革重新回到了老路上。

封建社會中，皇帝之人至高無上，幾乎沒有任何約束。因此，到底是選擇節儉還是選擇奢侈，完全取決於他個人的好惡與意志。或者說，只能靠他的良心發現與道德自律。而在今天，各級政府官員是存在諸多監督的，比如說組織監督、群衆監督、輿論監督等等。然而，或許是因爲人性的弱點太過頑固，或許是各類監督難以到位，所以，不少官員的辦公面積嚴重超標，即便是縣處級官員也有不少居然衛浴入室——辦公室；一些官員公款吃喝吃油了嘴，在「三公消費」新規相當嚴格的情況下依然變着法子吃喝——比如說用可樂瓶裝茅台；也有的官員的座駕依然超標。而在這諸多超標的背後，除去下面的拍馬屁之外，是不是也有居於高位的人本來就十分享受這一切的因素？

今天中國的GDP高居世界第二，保持經濟高速增長以保證就業與社會穩定十分重要。在這樣的背景下，假如徹底剷除「三公消費」是不是可能帶來與明孝宗的年代一樣的失業之憂呢？也因此，我們才有意無意地放了它一馬？而同樣需要追問的是，我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和了解的深度是不是應該遠超明孝宗？我們的社會制度是不是遠比明王朝先進？我們的道德與覺悟更應該遠勝明孝宗吧？所以對類似絲綢改爲紙張之後隨之可能產生的問題，我們應該不難找到解決的辦法。

文革心聲

往事鈎沉

楊光治

（四）

林彪自我爆炸之後，「革命」氣氛稍爲緩和，但是文化生活依然極其單調，八億衆生只准看八個樣板電影，人們在假日和不用參加政治學習的晚上悶得發慌，筆者不時悄悄地與幾位老友一起，通過「打牙鉸」（聊天）、喝淡酒、飲粗茶、抽劣煙來消耗時光。一九七四年的一次小聚餐中，談起「女禍」的話題，筆者一時興起，寫了這首《定風波·席上戲談「女禍」》：

妲己嬉嬉紂喪家，西施顰笑醉夫差。玉樹歌迷陳後主，離譜，胭脂井口夕陽斜。　浴罷華清湯尚暖，腸斷，漁陽鼙鼓震天涯。此乃皇家風趣事，甭理，今天酒菜頂瓜瓜。

當時人們普遍認爲「文革」之所以如此禍國殃民，全因江青搞鬼，認定這是女禍，因此筆者借妲己、西施、張麗華、楊玉環等歷史上著名的寵妃淫蕩誤國的傳說，來暗諷江青的罪惡。其實這種觀點是錯誤的，這些女人的負能量並非如此巨大，國家敗亡的責任不能由她們承擔；但爲了留下思想感情的眞實軌跡，不作更改。結句乃調侃之言，那時豈能置備「頂瓜瓜」的酒菜？

「離譜」是廣州方言，意爲亂說胡來。史載：陳後主喜歡吟唱《玉樹後庭花》，只顧與愛妃張麗華淫樂而不務國事，結果被迫投胭脂井自殺，我因而以「離譜」來譏諷他將政事「唱」得亂七八糟。有朋友認爲，將它寫進詩詞這是首創而且用得甚巧，令我有點飄飄然。

（五）

一九七四年冬偶翻書頁，發現枯薔薇一小丫，憶起它是十七年前於校園隨手採擷的。撫萼追時，悲欣交集，於是以枯花自喻，寫了《水調歌頭·枯薔薇》：

香殞色銷矣，芳魄散誰家？縱無丁點媚嫵，綽約見姿華。十七年兮風雨，多少精英佳麗，零落化塵沙。子竟存骸骨，命運也堪誇。　撫殘枝，追疇昔，盡煙霞。煙霞飄渺何處？野草遍天涯。造物端眞善戲，當日花兒肖我，今日我肖花。相對恍如夢，搔首且哈哈。

一九八二年秋，已調入花城出版社詩歌室工作的筆者，協助著名詩人李汝倫編輯全國首個舊體詩歌刊物《當代詩詞》，相處甚得，因此拿出此作以請教。這位曾被打爲「右派」的著名詩人認爲這是詠物佳作，尤其欣賞「子竟」、「命運」和「當日」、「今日」等句，但對「佳麗」句有意見。原作是「趨時佳麗」，他說：「我也幾乎零落化塵沙，但從不趨時！」隨手改爲「精英佳麗」，從之。其實，「精英佳麗」詞意重複了。

（六）

詩歌應是本人的生活和情思的寫照，然而自古以來也不乏代人抒寫之作。一九七五年初，筆者耳聞目睹一位小民的不幸遭遇，忍不住寫了這首《鷓鴣天·代人賦》：

塵海浮生夢覺遲，樂乎天命復奚疑。王侯螻蟻終成土，三島蓬萊不可期。

吾去矣，毋悲淒，從茲不再受凌欺。瀟瀟冷雨南陲日，我與兒孫永訣時。

詞中的「我」有文化教養而且性格善良，由於現在看來不成理由的理由而歷盡坎坷，解放後沒有找到一份正式職業，忍辱偷生但也難以維生。「土改」時被鬥得死去活來，「文革」的「戰備疏散」階段被遣送到僻遠之地。由於不是當地人而不被接納，可是廣州的戶籍卻已被取消，於是成了「黑人」，連糧食也買不到，重病也不能入住醫院，痛苦地逝世，慘哉！然而筆者又認爲，連劉少奇等大功臣，趙九章等大科學家，老舍等大作家都被折磨至死，對這位卑賤的蟻民來說，死倒是解脫——詞中有關「我」的思緒只是筆者的設想，若死者有靈，不知以爲然否？

（七）

那時，我們白天要上班，晚上還經常要回單位「學習」，學政治文件、讀梁效寫的文章、鬥私（心雜念）批修（正主義）等等。有一個時期，連節假日也不讓休息，例如有一年五一節，有關領導下令：「既是勞動節，就應當通過勞動來渡過！」於是全體回來搞衛生。運動令大家都心驚膽戰、筋疲力盡，我這個入過「牛欄」的人更是心灰意冷，感到前途渺茫。某個春季的星期天，領導突然宣布「可以在家學習」，意味着放假，於是我首次帶妻女到流花湖遊覽。這個湖是「大躍進」時開挖的人工湖之一，我曾多次參加勞動。那時，儘管烈日當空，蚊蠅撲臉、污水浸膝，也無人怕髒叫苦，因爲我們都認爲這是超英趕美的戰鬥，相信美好的共產主義即將實現。建成後它成了廣州市民憩息的佳境和「拍拖」的聖地，如今美景同樣令人陶醉，可是在陶醉之餘卻滿懷惆悵，幾個長短句子隨即湧上心頭，想將它湊成《風入松》一詞，然而有的句子卻改動不了，因此弄出這首《仿風入松》：

雜花滿樹掩層樓，楊柳漾腰柔。者是春魂婀娜舞，袖飄處，綠了荒洲。彩蝶旋飛繾綣，黃鶯婉轉綢繆。　春魂遮莫太輕浮，剎那便臨秋。伊欲去時從便去，我頑愚，不解閒愁。看慣飄零殘絮，任憑風雨颼颼。

下段對春魂的譴責是無理的，但我的確對春天已不感興趣了。「不解閒愁」是沒有資格也沒有心情去發這種愁。「看慣飄零殘絮」，意在言外。「任憑風雨颼颼」，是無可奈何的嘆息。有意使用「者」、「伊」、「遮莫」、「從便」等幾個古詞的語言來寫，雖然不符合《風入松》的格律，但自認爲頗有詞味，詩詞名家劉逸生讀了，認爲這屬「自度」之作，所以保留下來。

（中）

南國奇葩龍吐珠　念慈攝

器物精神

文化經緯

流沙

杭州的菊英麵館開在中河南路，靠近雄鎮樓，未上《舌尖上的中國》之前，在那吃碗麵需排隊半小時，現在有人在朋友圈裡吐槽，說現在吃麵需要排隊一小時了。

菊英麵館我經過幾次，但都不是飯點時刻，這家麵館最吸引我的倒不是那裡「片兒川」，而是每年七月至九月，會放兩個月的暑假，這在整個杭州也是絕無僅有的。老闆說，錢是賺不完的，讓員工也有個休養生息的機會，這應該是老闆的態度。

菊英麵館的老闆眞的是有「態度」的，一般麵館的衛生，抹抹桌子拖拖地就可以了，而在這家麵館，裡裡外外，上上下下，連吊扇上的灰塵每天也抹一把。

我認爲這是久違的「器物精神」。什麼是「器物精神」呢，是對物件的鍾愛，也可延伸於對從事的工作注入情操和人生態度，再說得大一點，那就是精神追求。

菜場裡有十幾個肉攤，其中有一攤位與衆不同，體現在刀具上，別人的攤販刀具黏着肉沫子，或是血淋淋的，他的呢，一塊純白的毛巾，時常擦拭，每一把都閃耀着銀光的光芒，整齊擺放。它的案台也乾乾淨淨，一丁點木渣也沒有，他倒不像是在賣肉，像是在西餐廳。有人買肉，一刀下去，手勢一拉，一塊肉就割下，沒有一點拖泥帶水。

這也是器物精神。

我沒有與他作過交流，許多客戶說他的肉攤清爽，清爽是外在的東西，其實裡面是有文章的。可惜，去年底肉攤新一輪調整，肉販不見了，不知他現在還賣不賣肉了。

中國其實是一個具有「器物精神」的民族，在明以前的中國古代，無論是中國人的科技發明水平，還是生活水準，在世界上都是數一數二的，當然中國人的精神追求也遠遠地高於西方人。最能體現中國器物精神的就是瓷器和絲綢，瓷器的功能本來就是盛飯盛菜，用個陶缽和竹筒也能達到，但中國人把它藝術化了，瓷器出口到西方，讓西方嘆爲觀止，它們發現原來吃飯的器具也可以做得這樣美。絲綢也同樣，把衣料這種生產必需品藝術化了。

而反觀當下的「器物精神」，我認爲是缺乏的，換言之，今天我們的精神需求是低的或者說是不入流的，大家都奔着利而去，大家從小到大都在想一個問題，怎麼賺到更多的錢，很多人沒有精神追求。所以一個生意極好的麵館一年要放兩個月的假，是讓人不可思議的；天天耗費時間擦洗店面的裡裡外外也是不可思議的。

再看我們使用的一些生活器具，嚴格地說，都是垃圾產品，並且讓人非常奇怪，反而是垃圾產品可以取得非常好的市場。

也有人把「器物精神」等同於「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只是它的第一個層次，更高的層次就是器物的美化，甚至藝術化，你製作一個物件或是完成一項工作，不僅僅爲了實用，而是內心所需，自覺而爲，然後樂此不疲。

就像那位賣肉的師傅，這樣讓人低看一眼的行業，裡面也可以有人生態度。

溥傑故居

人與事

海諾

愛新覺羅·溥傑（一九〇七年四月十六日——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故居坐落在北京西城區護國寺街五十二號。

溥傑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弟弟，其父親是第二代醇親王愛新覺羅·載灃，母親瓜爾佳氏，榮祿之女。一九〇七年，溥傑生於北京清皇室醇親王府。幼年在醇王府爲溥儀伴讀，一九三五年後在僞滿洲國中任職，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滿洲國滅亡。溥傑與溥儀逃至瀋陽，準備乘飛機逃向日本，被蘇軍俘獲。一九五〇年八月移交給中國政府羈押，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溥傑獲第二批特赦。

溥傑故居所在的護國寺街現已成爲京城有名的集餐飲、文化、旅遊、體驗京味文化的特色街，在入住的護國寺賓館裡得知，溥傑故居就在護國寺街，離住所步行幾分鐘即可，非常高興步行出門，詢問熱心的當地人，很快就找到護國寺街路南的五十二號，溥傑故居，是一座座南向北的院子，紅漆大門，走過影壁，進門向左，會看到一個典型的小四合院，北房就是當年溥傑的卧室和書房，南屋是個會客室，東屋是廚房和餐廳，西屋是秘書和保姆的卧室和辦公室。

據王銘珍在《信步護國寺街》中介紹：「清末的醇親王載灃，府第在后海北岸，他看好了護國寺路一塊地盤，爲溥儀之弟溥傑購置了一份房產，在護國寺對面，院子不大，僅有十多間屋子，當末代皇帝溥儀和末代皇叔溥傑一九六〇年，由撫順戰犯監獄特赦釋放回京時，溥傑就一直住在護國寺街這套私宅裡，溥傑被分配到全國政協工作，逝世後其女將這套房子獻給全國政協」。

溥傑被特赦後，曾被安排在景山公園工作一年，先後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周恩來總理邀請愛新覺羅家族到西花廳吃飯，在周總理的關心下，溥傑與妻子嵯峨浩重逢，此後一直居住在護國寺大街五十二號。一九九四年，溥傑因病於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七歲。

交朋友就是交命運

人生在線

朱國良

爲人處世，交朋友是必不可少的。因爲朋友可以獲得人格的薰陶、道德的感召、思想的昇華和互相的幫助；而時下不少貪官的落馬，也往往因爲所謂的朋友而多了一次犯罪機會、一根上吊繩子、一條判刑證據。顯然這類朋友早已蛻變腐化，且已臭味相投，狼狽爲奸。

朋友賢否，不可不慎。朋友之間，無論志趣品行，還是功名事業，總是相互影響的。朋友，是一個崇高的字眼，金子般的感情和純潔甚是可貴，但虛假的友誼也會披着華麗的外衣，在生活中大跳「假面舞」。一個人稍有不慎，便會有眼無珠認錯人，被「小人之交」和「勢利之交」的朋友牽着走。外國名著《卡里萊和笛木乃》中有一段名言：「道義之交是純潔的；利益之交雖然給人以恩惠，其目的總是以利爲主。正如獵人給禽獸的食物一樣，他並不是施恩，而是意在取利。」在一定意義上，交友也是選擇命運，是康莊大道還是泥濘小路，或者是陷阱，與此都有關聯。有的人在生活的道路上，沒有死在刀下，卻栽在蜜裡，往往是交友不慎之故。

朋友，實在是一個崇高的字眼，但如今又是一個氾濫的字眼。因此交朋友有些時候眞是選擇命運，故不可盲從，不可不慎。好友來清風滿座，佳書讀晦日生輝。人的一生如果交上好的朋友，出自眞情實意，又是志同道合，就不僅可以得到情感的慰藉，心靈的安撫，而且朋友之間可以互相砥礪，相互激發，成爲事業的基石。朋友之間，無論志趣品行，還是功名事業，總是相互影響的。我們觀察一個人一生的道德和事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身邊人的影響。

今天越是社會化的人，越是走向高位，人際關係也越複雜。一般的人，雞鳴狗盜之徒，烏合獸行之衆，倒不見得會害了卿卿生命，越是有權有位之人，「高處不勝寒」，這交友不慎，倒眞的會從天堂跌落地獄的。對於「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朋友」，自然更要處處提防，時時小心了。你想想，有的人當年多少威赫赫、勢衆衆，前呼後擁，朋友多如天上星，衆星捧月好威風，一旦東窗事發，必作鳥獸散，門庭若市到門可羅雀只是一瞬間的事！有的人口口聲聲說朋友多，路道廣，其實眞正的朋友恐怕一個也沒有，看似路廣實是窄道死路也！對這種人，我們大可不必羨慕。即使是他喝酒，你嚼饃，他開車，你爬坡，但終究還是你的境遇讓人心中安穩踏實。此外，現今因爲生活中還出現了不少打引號的朋友，利益放頭上，信義放一旁，當面拍胸脯，事後撣屁股的且不說它，更有甚者，因爲藉着走味的信任，披着虛僞的外衣，有人往往就從身邊人做起，盯住官方權利，這就要小心爲上了。